

文化大家梁斌

范 斌

梁斌先生的《红旗谱》因展现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历程而屹立于当代文学经典作品之列。半个多世纪的今天,面对这部作品我们仍然肃然起敬,那是中华民族的筋骨和脊梁!

先生在画坛更是独树一帜,造诣非凡。他少时绘画才能便显现出来,先后得到任芝圃、张化鲁、姚萼三位先生的专业指导,为日后的书画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之后梁斌先生参加革命,一手秉笔,一手持枪,戎马倥偬,直到1957年重新拿起画笔,晚年所绘大写意画更是直抒胸臆,多年后,凭记忆又画了一幅《秋风红叶》,充满浓浓的怀旧之情。

走进梁斌先生的家,如进入藏书楼一般,上千册的碑帖书画让满屋飘着书香,一箱箱装帧精美的四库全书肃穆陈列。新中国成立后,梁斌先生经常往来京津两地,故宫博物院、美术馆、和平书店、琉璃厂等都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藉藉深厚的文化情愫让他遇到有缘的东西就尽力收藏下来。梁斌先生说过,《九成宫》《张迁

碑》《礼器碑》《云峰山石象》《爨宝子碑》都是他临习的对象;石涛、八大、金农、任伯年、吴昌硕、尹秉绶等都是他学习的导师。一方面,先生的古籍、名砚收藏非常有名;另一方面,渊博的学识和对历代名作的摹写实践,既开阔了他的书画视野,也使得他能轻松驾驭中国画笔墨语言。

先生的绘画造诣离不开他深厚的文学修养。少年时期他就阅读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后来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喜爱郭沫若浪漫主义色彩浓郁的诗歌、小说,崇拜鲁迅、茅盾,接受了马列主义新思想,革命文学引导他走上了革命道路。他13岁参加革命,19岁成为“左联”作家。其间,为了阅读马列书籍,他努力学习英语、日语,从保定二师去北平求学时,已经能用日语翻译剧本了。他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研究外国文学作品,先生曾说:“我的第一篇小说《夜之交流》是洋味儿的,连语言都洋味儿,因为那时读的外国文学作品多,我费了很大的劲,才转到土上来,完成了我的民族气魄与民族风格,突出了我的创作个性。”可见先生那时就是一位浪漫的文人画家。



梁斌先生诞辰110周年 (1914.4—2024.4)

梁斌先生革命的追求和艺术的追求并行发展贯穿一生,实现完美的结合。赏先生的画,可以从历史角色、生命本色走进他的精神世界。

说到历史角色,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六十年一贯制,做一名战士为真理而战,为真善美而战。”他用实际行动和文学艺术作品践行着他的理想抱负。我们梳理他的革命旅程不难发现,他始终将个体生命与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13岁参加革命,五下白洋淀,七上太行山,主动请缨随军南下,和平时主动辞官著书。这样的人生履历反映在绘画作品中,就把万物的宏大气象与自己的革命经历所形成的宏大气魄结合在一起,比如他回忆革命峥嵘岁月的作品《阜平大黑山》《纪念陈庄战斗五十一周年》《狼牙山》等,以焦墨为主表现形式,突出了雄阔壮美的“梁斌气格”。中国画墨分五色——浓淡干湿焦,而焦墨本身在不掺水的情况下,俨然就是醇厚浓烈的酒,在饱和度和行笔速度变化中产生深浅、虚实、焦润的强烈对比效果。对于一位壮怀激烈复归平淡的老人,



更适情感上质朴炽热的表达,给人大开大阖的气象,进而达到朴拙雄浑的意象美,言近旨远的文学美。

说到生命本色,梁斌先生念念不忘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他始终乡音未改,保持着农民朴素的生活习惯。《红旗谱》成为一部为农村革命铸史,为农民立传的巨著。当他拿起画笔时,笔下的万物便超出物理的局限,更从情从真。说梁斌先生的画格高,就是说他笔下的意象都赋予了人格。看他笔下的花木鸟虫,昂首向天,像勇士,亦是自身精神的写照。老人家笔下的梅花,淡扫蛾眉不失高雅韵致。黄胄说“他画梅,多做满枝,老干虬曲,新枝横斜,全凭自己个性造型”,但“老在须眉”“充满健旺的生命力”。他曾于画面中心突兀地耸立着一棵松,如此处理虽然打破了构图上黄金分割的常规,但当我们看到“丈夫立如松,昂首向天穹”的题字时,不禁拍案称绝。如此正大气象,正来自先生那气质高洁、刚正不阿的人生底色。艺术评论家水中先生有这样一段话,“人们是在他的诗文基础上理解他的绘画,将人格、气节、诗文、书画视为整体生命的多角度显示。正是在这一点上,梁斌的绘画有着职业画家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

梁斌先生历经五十载,用生命写出《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翻身记事》,献给中国革命历史,纪念为中国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他把战友、乡亲留在文学作品里永远铭记,转身回归故乡高洁、宁静的灵魂深处,自由徜徉在宽阔无垠、与世无争的绘画世界里。晚年,他在《梅为百花魁》中题词道:“你画我的,我画我的,各有各法。”此时他已入书俱老,万法由心,这是一种无法模仿的表达,无需技术上的宝典秘籍,不拘一格的表达纯粹是精神自然的流淌。他又有严格法度,力求去伪存真,笔下缤纷的花海,施以淡墨,一丝不苟,以轻花轻草就,千姿百态共从容。他借雨中的荷塘,表现天地间丰沛的雨露,淡淡相间,墨点磊磊落落,藉藉勃勃生机。此处,他的世界纯净不染,心越千载,可以和《诗经》中的所爱载舞吟唱,可以和五柳先生抱朴归真先农醉卧,可以和东坡先生把酒临风寄情山水。

满庭芳

第五二五二期

本周推介的佳片是1981年上映的,由法国著名演员阿兰·德龙自导自演的影片《孤胆警探》。提到阿兰·德龙,中国观众并不陌生。在1975年上映的法国电影《佐罗》中,阿兰·德龙饰演的佐罗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作为较早进入中国的法国译制片之一,《佐罗》知名度极高,据统计,有超过7000万的中国观众观看过这部电影,阿兰·德龙也因此成为最早一批在中国火起来的法国演员。

柏林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法国“共和国文化艺术勋章”……阿兰·德龙有着许多光环傍身。有人说,他的外貌太英俊了,简直是老天爷赏这碗演员饭吃。但阿兰·德龙的成长经历其实极其痛苦,作家科莱特·盖斯坦说过一句话,阿兰·德龙认为是对他的成长经历最好的解读,那就是:“一个叫人难以忍受的顽皮的孩子往往是一个遭受着叫人难以忍受的苦难的孩子”。阿兰·德龙可以说是街头长大的小混账。4岁时母亲和父亲离婚,改嫁给一个猪肉铺的老板,继父非常不喜欢他,对他非打即骂,甚至生父和继父都把他像牲口一样赶来赶去,推脱责任。

童年的经历让阿兰·德龙变得叛逆要强。在连续被十几所学校退学后,少年阿兰·德龙彻底成为一个“江湖混混”,终日混迹街头,以打零工为生,当苦力,卖咖啡,当服务员,尝遍了生活的艰辛。但这样的经历也让阿兰·德龙拥有了有点凶狠又有点悲伤的迷人气质,备受女性观众喜爱。

1957年,阿兰·德龙先后被好莱坞制片人罗杰·科曼和法国导演伊夫·阿莱格看中,开始进入演艺圈,拍摄了他的第一部电影《当女人卷入其中》。迄今为止,他已参与拍摄近60部影片。今年89岁的阿兰·德龙历经多段感情的失败,与子女也并不亲近,独自生活在偌大的庄园里,与最爱的宠物们为伴,并不理会外界的喧嚣。

在《孤胆警探》中,阿兰·德龙饰演一个私家侦探,接手一件失踪案件,发现案件背后还有一个很大的组织在操纵着这一切……让我们走进这部四十多年前的影片,看阿兰·德龙如何自导自演一部充满个人英雄主义的电影。

5月18日22:13 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孤胆警探》,5月19日15:06“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阿兰·德龙自导自演《孤胆警探》

王泽一 曹宇田



致吴王夫差沉迷酒色,丧失警觉,误判大局,终致败亡之关键所在。何以在今人的意念中舞台上传说里,这献美之计却被“移植”到范蠡身上,对文种竟只字不提呢?

当然,我对现今的编剧大咖们也深表理解。演戏当然要有情爱故事,将“献美”安在范蠡身上,正可集中笔墨,展开戏剧冲突,这对表现他与西施的旷古情缘,自然是最为有戏的。反正,文种大夫早已湮灭于荒丘野岭,既无人也无法为之鸣不平了……

如果说,我的这种感受在三十年前“偶遇”文种大夫之时,便已隐然萌生,那么此后这些年,这种不平之念更随着阅世渐深和读史渐多,也是愈发强烈了。我并非漠视乃至轻视范蠡与西施的丰功伟绩,也无意抬高文种的历史地位。我只是一再反思:范蠡和文种,这两位情同手足的好兄弟,何以会在一路同行多年之后,最终却走出了各不相同的人生轨迹?

史载:范文二人同为楚国老乡,文种比范蠡大一岁。公元前516年,他在就职楚国宛令时与范蠡相识,时年文种21岁,范蠡20岁。从此,两人风雨同舟,甘苦共尝。尤其是在越国危如累卵之时,辅佐越王勾践,经历磨难,蛰伏自保,从匍匐于吴王脚下为奴,直至向死而生,励精图治,重振朝纲,最终复仇灭吴。他二人始终是同心同德,各勇才智,砥砺前行。他们的友情和勋业,本应成为一段青史佳话,为何最终他俩的结局却形同天壤呢?说到底,人生的选择,往往是成败系于一念之间,这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记得十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短文,题为《范蠡的规劝》,试图破解范文二人的命运密码——我在文中引用了范蠡在越国成功灭吴、朝野欢腾之际,写给文种的一封信,即《遗大夫种书》,信中写道:“吾闻天有四时,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终必否。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节,惟贤人乎?蠡虽不才,明知进退。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尽,良犬就烹。夫越王为人,长颈鸟喙,鹰视狼步,可与共患难,而不可共处乐;可与履危,不可与安。子若不去,将害于子,明矣!”

作为挚友,范蠡在信中规劝文种赶紧离开勾践,“子若不去,将害于子,明矣!”范蠡的理由层层递进,先说“人有盛衰,泰终必否。”你我已经达到了人生的鼎盛之点,再往前走,只会一路下坡了;再论“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理,我们两国已竭尽全力,对于掌权者而言,你已用处不大了,不如急流勇退;接着,讲到勾践其人:“越王为人,长颈鸟喙,鹰视狼步,可与共患难,而不可共处乐;可与履危,不可与安。”凭着范蠡长期与勾践共事的亲身体会,他深知此人绝非善主。照理说,你我都功高盖主之臣,没有你我,何来他的今天?他理当尊于高位,礼敬终身。可是,凭勾践的心胸和气度,他又岂能让你我与他分享荣耀和权力?言外之意,已是再明白不过了——走吧,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啦!

应当说,这是好友范蠡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剖心沥胆,痛陈利弊,苦心孤诣,劝导文种的一段实录。遗憾的是,收信人文种并没有接受范蠡的忠告,他并不认同范蠡的警世危言。文种的一念之差,就拐上了人生的岔路……

文种大夫未能悟到,此时的越王早已今非昔比,他一心只想称霸群雄,已无意于兴业富民。而文种在他面前,却总是强调要“养民”“富民”“亲民”。这是文种与勾践在治国方略上的原则冲突,既不可调和,更无从化解。于是,结局就只剩一途了——“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九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六在子,我为从先王试之。’”这是何等狡黠的辞辞:当初你教给我九条计谋,我只用了三条就把吴国打败了,剩下的六条还在你那里,浪费了多可惜呀!这样吧,拜托你去阴间教教我的先王,让他们打败阴间的敌手吧。

文种受剑,自刎而死。一代名臣就这样殒命于毕生忠心辅佐的君王,千古慨叹,无过于此矣!

文种死后,勾践将其葬于西山。后来,人们为纪念文种,将西山改名为“种山”。

反观抢先一步抽身而退的范蠡,结局却相当圆满——相传他携美女西施游走于烟波深处,从此杳无踪影。后来范蠡经商,成为巨贾,被后世尊为“陶朱公”,乐享人间的世代钦敬。

此刻,正值正午,我走出一身微汗,终于来到久违的文种墓前。蓦然发现,在墓亭前已有人祭献了数捧鲜花,顿时醒悟:哦,清明节快到了,越国的后人并未忘记这位因亲民富民而死于非命的先贤。这数捧鲜花分明昭示着:公道自在民心,斯言至矣!

写于2024年4月13日至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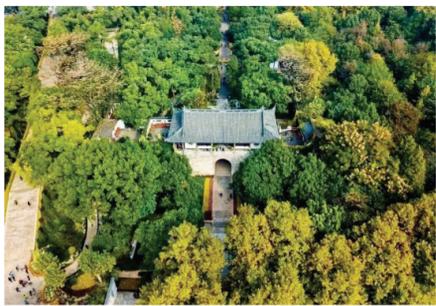
甲辰阳春,赴浙江绍兴参加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年会。临行前,心头掠过一丝期冀:这次赴绍,争取再去看看文种大夫,一晃,三十年啦!

上次探访文种大夫墓,应该是在1994年春天,我以茶文化研究者的身份,应邀参加杭州西湖茶会。会后,抽出一天时间乘早班车赶往绍兴。先把最著名的景点,若鲁迅故居、青藤书屋、沈园等处浏览一过,便直奔越王台。看过越王台,意犹未尽,又沿着石径登上后面的小山。当时,旅游业不如今天这般发达,山上并无明显的路标提示,我是信马由缰,沿路而行,左拐右绕,就走到了一块石碑跟前,定睛看去,碑上赫然写着“越大夫文种墓”几个大字,心下暗忖:今天能“撞见”文种大夫,不啻中了头彩。

之所以会作如是想,是因为我的游走偏好:大凡人皆去,游人如织的景点,往往排队靠后,反倒是那些冷僻寂寥且另有

文种墓前的慨叹

侯军



一番故事的所在,常被我先选。此前参观越王台,虽然是高台大殿,建筑恢宏,且游人也相对较多,我却匆匆而过,并未停留。眼下,偶遇文种大夫遗迹,我却怦然心动,绕墓三匝,流连许久。并不是这个小小的墓冢有什么特异之处,而是由这抔黄土,想到了两千多年前的吴越春秋……

转眼三十年过去。如果说,当年与文种大夫的“不期而遇”,只是在我的心底刻下一道凹痕,那么,如今的这次绍兴之行,应该说,这道凹痕已化成了一个心结。

然而,当我拿到这次年会的日程表时,却发现本次行程中,主办方并未安排越王台,也就是说,如果随团队而行,很可能会与文种大夫“失之交臂”。这,不免有些遗憾。我快速把全部日程扫描一遍,发现有一天的行程,正是众人皆知的那些景点,我都已去过了。当下心动:要不,就把这一身宝贵时光“挪用”到越王台上,不,是“挪用”到文种大夫的身上?对,就这么办!

向领队请假,并告知2号车长,均是一路绿灯,顺利放行。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我如愿以偿,奔向了心念所系的文种大夫。

依旧是石径清冷,依旧是游人寥寥,依旧是匆匆掠过越王台,直奔后山而去。独步石阶,我的思绪又萦回到吴越年间的那些旧事。几天前,刚刚在央视戏曲频道看过新编京剧《西施》;再往前推,在某档“活化”史籍的节目中,看到当下走红的几位学人解说两千多年前的吴越争锋,诸如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美女西施的“献身救国”,范蠡大夫的“智斗夫差”,等等。这些都是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然而,文种大夫又在哪里呢?须知在勾践被掳,越国危亡之际,是范蠡和文种两位重臣如中流砥柱,匡扶社稷,挽狂澜于既倒。二人相约,范蠡随勾践入吴为奴,蹈履履难,巧为周旋;文种则镇守国内,安民兴业,轻海自强。应当说,两位大夫功高勋重,足可比肩。何以千年以降,勾践成为发愤自强的励志模范,范蠡、西施成为历经磨难修成正果的爱情主角,而文种却被抛掷在越王台的阴山背后,几乎被人遗忘了呢?

我尤其不解的是,单论向夫差贡献美女这一招数,原本就是文种向勾践郑重提出的“伐吴九术”中的第四招——原文出自东汉会稽人袁康等编纂的《越绝书》:“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曰重财币,以遗其君;三曰贵余粟稻,以空其邦;四曰遗之好美,以为劳其志;五曰遗之巧匠,使起宫室高台,尽其财,疲其力;六曰遗其谗臣,使之易伐;七曰疆其谗臣,使之自杀;八曰邦家富而备器;九曰历甲兵,以承其弊。”可以说,这些谋略是导

的……此书只印三千册,不到半年已销售一空。此本是当时试印的样册,留作纪念罢了!”1981年10月的题记,提到当年集邮书请人作序之滥,及他为本书自撰序言对此提出批评,最后写道:“这也算邮坛掌故之一,述供一笑。”1982年2月,他又在那页题记的背面用铅笔写下两行字:“中国邮票史要由中国人来写(已办到),中国邮票价要由中国人来定(尚未办到)。”老集邮家的这些随想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集邮史。

邮缘(十五)

“邮魔王”黎震寰

吴裕成

关于“大龙邮票”,我曾记录下黎震寰讲述的故事。1940年的一天,时任天津邮票会常务理事的黎震寰,与天津邮局邮票发行总经办人徐家麟聊天得知,徐的岳父经历过1878年大龙邮票的首发——那天,邮政柜上第一次来了邮票,印着龙,五分之一。随即发售,徐的岳父买了一枚作纪念,因为恰值生日:旧历六月二十五——这一年岁次戊寅,公历为1878年7月24日。黎震寰向天津邮票会副会长李东园说起此事,后者正在东马路青年会主持集邮讲座,便让这故事上了讲台。同年7月出版的《天津邮刊》载文,认为大龙邮票首发日期应是7月24日。

时间过去40年,黎震寰旧话重提。集邮家杨耀增在1982年第6期《集邮》杂志

刊文,引述从黎震寰那里听到的故事,以证大龙邮票7月24日天津首发之说。半年后,上海海关杜圣余在《集邮》杂志披露,档案记载大龙邮票于1878年7月18日寄往主试办邮政的天津,天津海关于7月24日签收。《集邮》杂志的两篇文章,引用口碑材料一文在前,列举档案史料一文随后,真可谓天造地设般相互印证。

就此,大龙邮票首发日期可以论定了吗?遗憾的是,天津海关没能找到相关记载。在当

年试办邮政的五个地方之一的牛庄(营口),发现了1878年8月1日的发行记录。著名集邮家孙君毅据此主张“8月1日首发说”,并向各地知名集邮家征求意见。黎震寰复函说:“天津是大龙邮票的发源地,那时又迫切需要邮票,既然7月24日收到,则发行日期不会落在牛庄之后。你因目前只能找到牛庄有正式文件,就认为8月1日是大龙邮票首次发行的日期,这种‘有奶便是娘’的想法,我不能同意。”孙君毅回信表示坚持己见,同时认为黎震寰的看法也有道理。

作为著名集邮家,黎震寰识辨辨伪,眼力十分了得。清代发行的慈禧六十寿辰纪念邮票,通称“万寿票”,随时光流逝而成珍稀。有人伪造了一批“万寿票”高价售卖。这骗不过黎震寰,被他鉴别出来。邮商想捂盖子,游说他不要多管闲事,威胁、利诱

一枚枚方寸大小的邮票,以严苛的选题筛选与考究的票面设计,将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汇为海量的图像数据库,在服务邮政的同时,造就了庞大的拥趸。热衷于此的人们互为邮友,其中佼佼者称为集邮家。所谓邮缘,既是人与集邮品的那些事,也是人际交往。

这里,谨忆集邮家黎震寰先生。

初识黎先生是在1985年5月。“我的年岁,年份末两位数减二”,他笑着说。那年先生83岁,在家编《天津集邮》。这是季刊,天津市集邮协会主办,1983年6月创刊。请这位耄耋老人编刊,可谓一种延续。早在1950年津门市集邮界创办《天津邮学月刊》,就邀请黎震寰担任编辑顾问,每期审稿把关。

交往多了,熟稔起来,听黎先生谈及一些过往。上私塾,上学堂,学英语,年轻时的黎震寰有过潇洒的生活,曾陪阔太太们打牌,以张勋太太为首。20岁出入铁路局,开始集邮,是京津地区较早的集邮者,天津邮票会的发起人之一。1943年,他出版了旧中国第一部邮票史《中国邮票图鉴全集》。1952年,《中国人民邮票图鉴》在香港印行,首次系统介绍中国解放区邮票。

编著这样两部邮票图鉴,需要藏品的数量和质量都很可观吧?我曾提问。黎先生说,初涉集邮时没设专题,几年后确定专集中国票,渐渐积攒了不少。要编图鉴,还不够,就向邮友借,或者出让一些、收进一些,互通有无。

先生所著《中国邮票图鉴全集》,书前加贴的扉页上,1979年5月题记:“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用中文写的旧中国邮票史。我编写此书的动机,是想替我国集邮界争气。在此书出版以前,有关中国邮票的专著都是外文



沽上丛话